

关于当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的 主流新自由主义叙述之批判

R.佩弗¹/文, 洪 楼²/译

(1.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 哲学系, 美国; 2.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关于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当代主流观点。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对之进行批判: 资本主义已战胜社会主义且无可替代的论断是极其草率的;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 资本家对于现代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并非不可或缺现代经济制度要保障充足的投资收益以吸引资本, 以及为避免经济萧条和衰退必须吸引私人资本进入经济体的“有经济效益的”部类, 这些说法都不成立; 新自由主义并非全球化时代最好的安排方式。

[关键词] 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资本市场;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7)03-0022-08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7.03.003

本文第一部分总结了我认为的当前关于经济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普遍信念”(received wisdom); 这一套学说是由当前大多社会中的许多有权势的精英(包括学术精英, 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精英)所宣传的, 并且不幸的是, 大多数人未经批判地接受了它们。在第二部分中, 我将对这些观点做出详细的批判, 我认为, 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要么是完全错误的, 要么至少具有很强的误导性, 它们有意忽略其他可行的社会和经济安排方式, 这些安排方式在现如今的历史阶段中是可以存在的。

一、“关于当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官方’叙述”之概要

根据一般的界定,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包含广泛的“自由”市场、多数大型企业的私有制以及以追求私人利润为首要目的的生产; 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包含多数大型企业的公有制和以追求公共物品为首要目的的生产。需要注意的是, 按上文所言, 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是否包含市场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界定, 这使得从定义上来说, 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可能的。

请思考下面这些论断和论证, 我相信它们从整体上代表了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经济体制的“普遍信念”, 将要讨论的内容包括: 它们是否为真; 是普遍地为真, 还是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为真; 如果绝大多数人接受这种“普遍信念”会有什么后果。

(1) 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并且绝不会(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被其他的经济体制所取代。因为相比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更有效率, 并且与自由和民主(民众对此极其向往)更好地相容。

(2) 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有效率, 是因为它有着(相对)自由的市场, 这不仅可以通过激励技术创新和创业精神, 还能够促进资本投资以及——凭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确保生产资源以有效的方式(趋向于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实现)

[收稿日期] 2017-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正义批判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14BKS008); 福建省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宗教与世俗视角下的道德基础研究”(FJ2015C00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罗德尼·佩弗(Rodney Peffer)(1952-), 男,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 全球理论; 译者: 洪 楼(1984-), 男,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 伦理学。

进行分配和利用……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这些优势中的任何一种。

(3)关于资本和资本家的本性:A.(在一切现代物质社会中)经济生产的基本投入是:土地(即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B.资本来自资本家,因而很明显,资本家对于任何要有一定效率的现代经济体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没有资本家,就不会有任何资本投入(注入)到经济中,于是经济也将陷入停滞。C.在任何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即(在经济体的市场部类中)以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为目的,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集聚起来。

(4)关于获得投入到现代经济中的资本(即关于激励资本家投资):A.为了有充足的资本投入经济中,一切现代经济体(即各个社会)都必须保证可以赚到“足够的收益”以吸引资本家提供资本。这些收益来自他们自己的生意利润,以及/或者来自他们所持股票的增值,以及/或者来自他们持有的债券利息或贷款利息,贷款对象是其他企业、其他资本家和企业家、政府(当他们购买政府债券时)。如果不相信能够得到“充足的收益”,那么他们常常会把自己所控制的资本投入到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国家——他们相信可以挣到更多钱的地方。这就是全球化、网络化和新自由化的经济中的资本外逃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问题。并且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现代社会(经济体)都必须确保资本家可以因其资本赚取“足够”利润的主要原因所在。B.在现代经济中,为了避免衰退和萧条,仅仅让资本家有信心获得充足的投资收益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激励资本家在经济的某一特殊部类中投资;即经济体中的以销售为导向的、货币流通的、“有经济效益的”那一部分。在所有(或几乎所有)当代社会中,经济的这一部类是由股票市场所代表的。股市为一个经济体的这一部类提供投资资本。现代经济体的另一个大的部类是经济体中的基础设施部分:公路、高速公路、人行道、政府大楼和设施、大坝、海堤等等。经济体中的这一部类也需要巨额的投资。但在所有(或几乎所有)现代社会中,政府提供了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政府通过税收或各种招待会、并且还常常通过发行债券以获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政府债券有确定的收益(到期支付的利息)。尽管这类债券的利息通常要低于资本家在股票市场上一般预期获得的收益,但投资政府债券的优势是,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有损失……除非政府垮台或者拖欠借款。(并且,很可

能,他们只会从他们所信任的政府那里购买债券)。

基于以上事实,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资本家“对经济感到悲观”的时候,他们常常从股票市场(即经济体中“有经济效益的”、以销售为导向的部类)中撤出来,投资政府债券,或者仅仅在其他投资(比如,房地产、贵金属或者高价艺术品)中“停放他们的资本”(park their capital),他们觉得在这一特殊的时期,这些投资要比股市安全一些。然而,如果足够多的资本家不在经济体的“有经济效益的”、以销售为导向的部类中投资(或者如果他们通过从股市撤资的方式将太多的资本从经济体的这一部类中撤出),就会引起衰退,并且有可能引起萧条。而且当资本家相信不会得到“足够的”投资收益时,或者当他们相信处境危险(例如,他们可能损失全部或部分资本)时,他们肯定会拒绝在经济体的这一部类中投资(或者决定从这一部类中撤资)。

(5)新自由主义作为当前全球化时代最好的安排方式:A.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之下,一个政府必须保持低水平的营业税(以及所得税),这样企业就不会将其设施和运行转移到税收和劳动力成本都更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B.如同在国家层面上那样,自由市场在国际层面上导致了更高的经济效率,并因此为参与到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加入WTO等方式)中的任何国家带来更高的GDP。此外,因为“上涨的潮汐托起了所有的船,大船和小船”,所以凡是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政体的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将会更好。C.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或至少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政体并因此降低或废除进口商品的关税,而不是采取补贴“本土”产业等做法。

二、“关于当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官方’叙述”之批判

接下来我对上面这些论断进行详尽的批判,这些论断构成了当前关于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普遍信念”。

对(1)的批判。至少可以说,上述论断是极其草率的,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1993)一书中曾鼓吹过这些论断,另一些人在苏东剧变之后也鼓吹过这些论断。尽管基于当前的历史证据,这些论断初看起来言之有理,但这里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比较,主要针对的是指令性经济(command-economy)的社会主义制

度,而非市场社会主义的(market-socialist)经济制度。而且,衡量经济效率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经济效率的定义。例如,尽管在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体中,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点上,市场经济似乎要比指令经济更有效率(因为指令经济缺乏反馈机制),但如果要问哪一种经济体制在快速建设一个低水平的(欠发达的)经济体方面更有效率,证据就站在了指令经济这一边。例如,苏联从1921年到1939年短短18年间就从内战后的百废待兴状态发展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并最终在东线战场上击败了纳粹德国。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发展是在几乎没有外资的帮助下完成的。

但为什么能够这样?为什么对一个经济体中的大量投资财富的政府(或者公共)占有和支配竟然具有这样的优势呢?如我在别处指出的,可能的“股票市场的恐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特征,反过来它又会导致衰退甚至萧条。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投资的混乱本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股票市场代表着经济体中的以销售为导向的、货币流通的那一部分,这与基础设施部分(包括公路、高速公路、桥梁、大坝、海堤等)相对立,后者常常是由政府所有和运营,并且不具有销售导向和货币流通的本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很多大规模的私人投资方(个人、家族、合伙人、公司、货币市场经理、退休账户公司等),他们根据对最高利润(即从投资中获得最高的“收益”)的预期向股票市场投入资本资金或从中撤出资金。这些决定是基于他们对于利润多少的个别估计(向股市注入资金或从中撤资),这与(举例来说)抛售或购入政府债券是不同的,也不同于在经济悲观时期(尤其是股票市场恐慌时期)将资本“停泊”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

在股市恐慌时期,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决定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撤出股市,这会造成滚雪球效应,因而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撤出。尽管这些恐慌常常伴随着一些客观特征,比如一些大的投资者的预期即“经济泡沫总是要破的”(即被过高估价的资产必定要经历一次显著的“市场矫正”以便回到真实的价值水平上来),但现实中,股市恐慌的发生并不一定会呈现这些消极的经济特征。股市恐慌的必然情形是,一些大投资者将巨额资本从股市撤出,然后其他大部分投资者注意到了,也跟着这么做,于是滚雪球效应就开始了。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防止这种市场恐慌(以及相应的衰退)的做法——尽管存在争议——是,公共部门(国家)拥有足够的资金,这样就

不可能发生巨额资本撤出经济体的生产部分(因为没有—个明智的政府,在明知会造成严重的衰退或萧条的情况下,仍然从经济体中的任一部类中有意并且突然地撤出大量资本)。这是其他国家应当吸取的经验;并且这也为下面的观点做了论证,即在经济体的核心部门中保持对大部分赢利企业(并因此包含大部分投资资本)的公共占有与支配。

对(2)的批判。首先,资本主义是否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要明显优于社会主义经济(哪怕指令性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点尚未可知。毕竟,冷战时期,在纯粹科学以及应用科学领域(包括军事和航天技术),苏联的指令性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与美国和西方保持同步。然而,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市场经济确实要比指令经济在消费产品方面更好地激励创业精神。但是这并未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优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者同样能够促成和回报创业精神。第二,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一样,指令性经济也有其产生和引导投资的机制,这些投资并不依赖于资本家的“储蓄”或者他们用这些“储蓄”投资的意愿。第三,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能够保证生产资源以有效的方式分配和利用(趋向于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实现),这并未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优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尽管它的确赞同这两种市场经济优于指令性经济的看法。

但在此我们还应注意另外两点。第一,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推断市场经济在实现经济效率方面是最有成效的——依赖于一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大范围实现的假设。这些假设包括:(1)完全竞争性的市场;(2)完全理性的(和以自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参与者;(3)完全没有经济外部性(economic externalities);(4)零交易成本;(5)对所有经济参与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当前和未来偏好的完全知情。不用说,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条在任一宏观经济情形中都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因而,一方面,就以概略的方式观察和评价经济选择而言,运用这些经济理论可能有用,但另一方面,如果相信这些理论永远精准地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则是荒谬的,并因此完全依赖于它们也是荒谬的。

第二,帕累托最优要求本身是一个非常弱的要求——在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它是一种被渴望但永远得不到的东西(the Holy Grail)。满足这一要求的条件仅仅是:在一个给定的经济体中,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之内,在没有其他人境况变坏

(就他们对物品和服务的要求而言)的情况下,没有经济参与者的境况能够更好。在一种市场经济体的整体情形中,这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例外情形,在这些情形中,能够生产更多产品或服务(且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生产机会没有被利用。因此,几乎任何物品和服务的实际利用和分配——无论是生产物品还是消费物品和服务——都是帕累托最优。例如,如果一个资本家宁愿花10亿美金购买高价艺术品而不是将这笔资金投入农业部门,后者——让我们为了这个例子假设——是使他的一百万同胞免于饥饿致死的唯一途径,这种情况仍然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由于:为了拯救民众免于饥荒之故而划拨资本家用来买艺术品的这笔钱中的一点点,就他/她的消费偏好而言,都将使得这位资本家的经济“境况变糟”,哪怕这能够使许多绝境中的人境况大大改善(从经济上来说如此,从他们的基本健康和生存的角度来说亦如此)。因此,哪怕这样的情景——在其中,百万民众毫无必要地饥饿致死——也仍然达到了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要求!

对(3)A的批判。只要我们明确“资本”一词是指实体经济中的实际资本部分(即诸如建筑、厂房、机器、交通体系等实物资本以及诸如专利和版权那样的知识财产资本),而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虚拟经济的(寄生)层面上存在着的抽象的、无定型的“资本”,那么,这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在后一种意义上,资本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一个经济体的各部类中流入或流出,或者在某些特定国家中流入或流出,并且(被设想为)只有资本家才能提供。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包括大多数主流的经济学家)花费精力做这一区分。结果就造成了在许多人那里的持久而广泛的混淆:通过一个语言上的花招,这些人被误导而相信,土地、劳动和资本(第二种意义上的)是一切现代经济体的三种基本的(和固定不变的)投入。但这当然是错误的。第二种意义上的资本——只有资本家才能提供的东西——不是一切现代经济体制的基本的或者必要的投入和成分。无须太多思索便能明白,资本的这两种意义的混淆(或模棱两可)可以用于对资本主义做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辩护:当第二种意义上的资本被认为是任何现代经济体系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时,伴随的直接结论就是,资本家也是任何现代经济体制的一种必要的和不可消除的成分。从这一假定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也一定是必要的和不可消除的。任何对于晚近历史有粗略了解的人,只要稍作思考便会直接驳斥这一论断。毕竟,在

已然存在的(其中一些将继续存在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体中,并没有(第二种意义上的)资本或资本家。但因为某些原因,大多数人并没有独自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这些事实鲜有被他们注意到——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或贸易倡导者们(business advocates)。

实体经济是由自然资源、实际资本和人类劳动力(它不仅包括人们的身体技能,也包括智力技能)构成的。寄生性的虚拟经济是由巨大而复杂的所有权和契约权利(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利)网络构成的,不同的个体、家庭以及其他的个人团体(如合伙人、公司、法人)对于实际的经济资产拥有权利。

对(3)B的批判。尽管这是许多人拥有的一个常见的预设,然而,一旦我们明确规定我们说的是实际资本(与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虚拟资本相对立),那么“就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言”,它只是对资本主义体系才是正确的。首先,我说“就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言”,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一切现代社会的经济体中,这些社会的政府常常占有和控制着经济中的重要部分:至少是基础设施如公路、高速公路、街道、大坝、海堤、地铁和公交系统、军事基地与装备、警察局与警用装备、政府大楼与各种设施等。在许多现代社会中,经济体的公共部分所包括的比这些要多得多;比如,铁路、航空、电力和水利、下水道系统甚至银行和基础工业。而且,很明显,创造、提高和保持经济体的这些部分要用到大量的实际资产,也用到大量的自然资源 and 人类劳动力。因此,即便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内一切资本都是由资本家提供的这一说法,也不是正确的。

但我这里的主要观点是,就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而言,它仅对资本主义体制而言才是正确的。我的这一观点将变得很明显,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指令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苏联)以及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如1950—1989年的前南斯拉夫)在其体制之内均存在着实际资本的产生和分配机制,哪怕总体而言在这些体制之内并不存在着虚拟资本。因此,资本家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制(甚至任何市场性的现代经济体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换言之,只有在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演化为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资本来自资本家”这一论断才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私人个体(以及形成合伙人、公司和法人的个人群体)才真的占有和控制着大部分实际资产,这些资产的使用必须征

得他们的同意。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经济体制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性的还是指令性的——向一个企业“提供资本”就意味着,有权使用实际资产的任何人,允许这些资产以某种方式或为了一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报酬)而得到使用。这就是“提供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全部意义:“提供资本”就是允许一定的实际资本资源得到利用。因此,提供资本的功能可以由个体资本家(或法人)、合作社和政府来执行。因此,这一点很明显,在一切现代经济体制中,资本家对于提供(或提高、利用、投资)资本来说,都不是必不可少的。

上文我把资本主义说成是“‘特殊的’财产安排方式”,不是因为今天的大多数人把它们看作特殊的;恰恰相反:在今天,大多数人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法律安排方式视为完全自然的东西;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们不是唯一可能的经济法律安排,而且难以理解存在着其他现实的历史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已经(且能够)实现。因此,当我把这些资本主义的安排方式称为“特殊的”时,我的目的是让人们用一种与通常方式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们;也就是说,将它们看作是历史中偶然的社会安排方式,这些社会安排方式既不是“自然的”(必然的),也非上帝给予的,而是人为产生的社会安排方式,这些安排方式易于受到人类的道德评价的影响并且——如果被发现有缺陷的话——会被修改。请允许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人类及其文明能够幸运地延续到下个世纪——凭借理智地和勇敢地处理我们现有的各种困难问题(除非有好转,否则很可能会更加糟糕)如极端贫困和不平等、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政府的压制甚至折磨、环境破坏和退化、各种偏见与压迫等——那么,我相信那时人们回望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会惊讶于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大多数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甚至包括许多被这一体制剥夺和成为其牺牲品的人)当作是完全自然的和合法的,哪怕它是明显地有缺陷的和不公平的。我认为,22世纪的人们(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一天并且仍然有完好的文明的话)回望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阶级结构时,很可能将会像我们现在回望封建社会的财产关系和阶级结构那样;也就是说,视之为有缺陷的和不公平的荒谬之物,并且不值得在其之下生活的人对其保持忠诚。

另一方面,这不是要完全否认这一保守的准则,

即我们应当对历史演化而来的社会安排方式的随意修改或对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保持谨慎的态度;因此,既要从社会科学理论的角度,也要从清楚、无偏见的历史证据的角度进行观察,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提出替代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与安排方式的详尽的现实的模型,这一点也很重要。马克思理论(以及大部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大缺陷之一是它的遗留的黑格尔式的看法,即随着历史的进展,“历史(History)”自然将会提供正确的制度安排方式。不幸的是,这导致了马克思(以及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刻意拒绝“推测”未来的社会主义以及随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运作。马克思(以及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这一论断,即未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市场被认为是有许多缺陷的),这一体制以一切大型资产和企业的公共占有和支配为基础,并且后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有有一个以直接的参与民主制度为特征的政体体制(例如为期六周的巴黎公社的历史试验)尊重公民自由(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评论的那样),并因此还会有一个“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更加民主”(引自《共产党宣言》)的政治体制。但马克思(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拒绝“推测”在这些非常笼统的轮廓之外的新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引述 G.B.Shaw 所说的话(这于我是一个合理的建议):“若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所提出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不应信任任何人的政治观点”。

对(3)C的批判。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和资本家群体之间有重叠,但哪怕在这样的社会里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成功地成为资本家,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企业家。首先,许多由企业家(或准企业家)的商业冒险都失败了;另外一些冒险在能够偿还债务的意义上是成功的,但从未成功到使非资本家出生的企业家进入到由资本家阶级所占据的经济高层地位。其次,尽管有些资本家(如大卫·洛克菲勒,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大通银行的主席)选择从事企业和商业活动,但他们并非必须这么做。事实上,许多人选择了不这么做,而是选择进入政界(如尼尔森·洛克菲勒),或从事慈善事业,或周游世界。资本家阶级中少部分人竟然成为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成为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他的家族在英格兰拥有工厂)。一个晚近的例子是阿比·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女儿,她是一位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人士,而且是革命古巴(Revolutionary Cuba)的活跃支持者以及古巴政府的经济顾问。

另一方面,创业精神无法(或者不应当)在一个市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得到重视和回报,这一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实际上,大卫·施韦卡特(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制)模型包含了促进和奖励创业精神的具体规定。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大规模的生产性资产都归社会所有,并因此,不存在投资收入或投资财富之类的东西,它们来源于对这些大规模生产性资产(组合的基础设施或自然资源)的个体或私人所有。因此,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企业家也不是资本家,因为根据定义,资本家是那样一些个人,他们拥有足够的大规模生产性资产以产生足够的投资收入,这样,无论是否选择去工作,他们都可以无须工作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会存在任何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几乎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认可,一切小规模的企业应当为私人所有,并且应当鼓励小型企业的扩增与成功——通过必要的信贷途径、对小型企业的公平的税率等手段。

而且,有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包括我本人)还认为,让个人把小型企业发展为中型企业(如果它们能够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做到这一点的话),也应当是可行的。有一个附带条件,即任何企业在达到一定规模(无论是根据雇佣人数还是根据每年的物品和服务的销售额)成为法律界定的大型企业之后,都应当被公共部门(政府)以公平的市场价值从所有者那里收购^①。在合法纳税之后,这些私人企业家可以把部分或全部利润投入到另外一个小企业中,并且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再一次将其发展为大型企业(在达成这一目标后,他们又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出售给公共部门)。理论上讲,企业家在其一生中许多次做到这样,但是他们绝不会成为资本家的理由是,即使他们有足够的储蓄而无须再工作(如果他们选择不工作的话),他们也不是依靠来自投资财富(例如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股票、债券,以及/或者租赁财产)的投资收入而生活。

市场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公共乐透(比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存在的),这种说法完全没

有道理。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中奖者所征的税可能要高一些,但是仍可以设想有人在这样的乐透中赢得千万美金。显然,如果他们不挥霍钱财的话,在余生中,他们应当可以过得很舒服——甚至富足。但他们仍然不是资本家,因为他们不是从大量实际资产的占有中得到财富,且他们也没有从这样的投资财富中获得投资收入。此外,即便他们可能用新得到的财富开办一个小企业,并且试图使其发展为大型企业,但是,这也仍然不会使得他们成为资本家。

许多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者(如罗尔斯)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者(如大卫·施韦卡特和我)也都支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除了所得税(以及可能的其他税种)之外,任何公平的社会都必须有严格的遗产税,这样大量的财富(无论如何得到的)就不会在一个家族(或者其他的社会团体)内部代代相传,以至于出现一些富可敌国的家族。但是,遗产税的基准线是非常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不应有任何财富在家族(或其他的社会团体)内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但我认为,任何人都应当能够向他们的家人(或其他人)提供一份最低限度舒适的“储备金”(nest egg):若不工作或做有收入的事情,则不足以度过余生,但足以直接买一套房子或办一家小型企业。

甚至沃伦·巴菲特也同意这一普遍的观点。令人敬佩的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挣得的惊人财富——他是靠自己挣得的而非继承得来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来,是许多不同的个人多年创造的社会财富,作为一位企业家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以及足够的运气)得到这些财富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相比于认为只有把这笔巨额财富——我最近一次听说的是700亿美金——传给他的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朋友)才是公平的,巴菲特采取的做法是,为他的每一个孩子建立有实际意义的基金会,他们可以在其中工作——可能是作为执行董事——并且能够从中得到一大笔足够的薪水过上舒适的生活。至于其余的巨额财富,巴菲特先生已经做好安排,在他身故之后,捐给各种慈善机构。在我看来,巴菲特先生——以及那些持有类似观点的富人,如比尔·盖茨——不仅应当受到称赞,还应该因他们高尚的想法和行为而被视为道德楷模。但是,期望所有的资本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未免幼稚:因此,有必要通过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来使得由巴菲特先生和盖茨先生所表达(和践行)的价值成为经济体制的结构性的一部分,而非依赖于个别资本家的德行。

这些考察将我们引向这一问题:(从道德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不是构成一个现代经济体的最好途径,甚至是不是一个可接受的途径?因为大多数有良好教养的人(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地认为,资本主义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一种无可挽救的陷入衰退的倾向以及进一步陷入萧条的永久的可能性——所以,真正的疑问是,是否存在一种没有这些问题的经济体制,同时这个经济体制也没有其他的(甚至更严重的)缺陷,并且它还与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容。当然,我的答案是,有这样一种体制,即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社会有着尊重和保护公民自由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在其中尽管一切大型企业和资产都是由社会(公共地)占有和支配,但是存在着对于生产和消费物品来说的广泛(但也受到调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经济体的以销售为导向的部类中的企业相互竞争(并且在其中,大部分长期未能盈利的企业,在经过数年的非营利状态后允许破产)。此外,在我提出的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版本中,一切小型企业可以由私人所有(并且通过公共经济政策——如针对小型企业的贷款途径和公平税率——鼓励其存在),同时,中型企业可以是私人所有制和公共所有制的混合物;但是,如上文所解释的,如果任何私有企业达到了大型企业的水平,它就应被公共部门以公平的市场价格收购。在这样的体制当中,许多人在其有生之年可能变得非常富有——或者凭借他们的才能与努力,或者凭借纯粹的运气(比如中彩票)——但是,在拥有足够的生产性资产以产生“投资收入”(这将使得他们过上一种奢华的生活而无须做任何别的事情)的意义上讲,没有人是资本家;没有人被允许将巨额财产赠予他人,尽管他们被允许向这些人留下“储备金”。

对(4)A的批判。这里只需指明,“为了有充足的资本投入经济体中,一切现代经济体(社会)都必须保证可以赚到‘足够的收益’以吸引资本家提供资本”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比如苏联和其他称作“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出了非常大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持续了数十年,却没有让资本家将资本投入到这些经济体以销售为导向的、货币流动的部类。实际上,在这些社会中,这样做的话将是一个“纯粹的把戏(neat trick)”,因为在这些社会中根本就没有资本家。并且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社会——比如古巴——它并非主要依赖私人资本家而得到足够的资

金来运作其经济体的这一部分。此外,哪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来说,通过法律和政策来限制资本流向其他国家,也是可能的——尽管可能比较难。但是,即便这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必然会解决下面提到的问题。

对(4)B的批判。首先要注意这一情况的特殊之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当资本家相信一个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不能良好运行,并且这种信念常常由于客观因素而确立起来的时候,资本就会从股票市场流出,而进入到政府债券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例如,由于察觉到经济周期的下行态势将要出现(或者由于某个或某些别的客观理由表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减速),资本家们就会这么做。但实际上,这一情形并不是必然的,即一个经济体正在客观地走弱,这样才有了足够多的资本家相信这将引起股票市场的撤资;完全可能的情形是,足够多的资本流出经济体的这一部分引起了衰退甚至萧条,哪怕一个经济体完全“健康”!(当然,众所周知,经济是难以预料的。)

更重要的是,对现代社会来说,经济体制并不是必然地要带有这些不合理的缺陷。也就是说,在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关于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中,没有什么会将我们引向这一信念,即当代经济体制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那样来建构,并因此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经济体制,因而没有这些特殊的缺陷。当然,这些替代性的经济体制——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体制——是否有其他的缺陷,这些缺陷使得它们(总体说来)更没有吸引力,这是众所周知的“关键问题(sixty four thousand dollar question)”。但是,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为避免经济衰退和萧条,一切现代社会都必须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其经济体的“有经济效益的”、以销售为导向的部类。这仅仅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才是正确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这一难题,这一事实既是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又一个论证,也是赞同替代性经济体制的另一个理由,这个替代性的经济体制的运作,不必依赖于资本的私人所有者(比如,就资产使用之许可而言必要的私人控制者)的变化。

对(5)A的批判。只有当一个特定国家的政府缺少权力或政治意愿来限制资本外流到其他国家时,这一点才是正确的。在当今以及可预见的将来的大多数国家中,这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而在我

们关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一般知识中,没有什么会使得任何一个无偏见人相信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比如古巴)就能够这么做。甚至混合经济制度(我指的是在定义上界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比如当今中国,就能够拥有巨大的权力阻止资本外流。尽管有争议,正是这一因素,连同其经济结构和政策的其他社会主义特征的成分,为中国近期的成功(相比于世界经济体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并且,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个优势。

对(5)B的批判。存在不同的衡量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方法,并且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效果的评价也有不同。然而,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未惠及接受这些政策的国家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口。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这样的社会中最贫困那部分人的艰难处境,反而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始于1980年代)而恶化了。因此,尽管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即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大多数接受这些政策的国家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下面这一说是错误的,即“凡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政体的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或几乎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将会更好”^②。

对(5)C的批判。对这一论断的讽刺性批评是:

存在着确凿无疑的经验证据表明,关于这一议题的真实说法正好相反。比如,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1950至1980年代在亚洲经济体中 fastest 和最大规模的发展,取得这一发展成绩的原因是:以高关税保护新兴的本土产业,并对这些产业给予了大量政府补贴,并且还在经济活动中实行了明显的政府干预。与此类似,中国从1980年到现在凭借完全相同的措施和政策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和政策全都与新自由主义的规定和要求相背离。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在其大作《坏撒玛利亚人:自由贸易的神话与资本主义的秘密历史》^③中,彻底推翻了这一经验性论断。

注 释:

- ① 根据2011年的美国经济:小型企业被定义为不超过10位雇员,且/或每年的物品或服务的销售额不超过500万美元;中型企业雇员不超过100位,且/或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
- ② 参见 Kevin Danaher & Roger Burbach (ed.), *Globalize This!: The Battle Agains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③ 参见 Ha-Joon Chang, *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 Bloomsbury Press, 2007.

A Critique of Mainstream Neo-liberalism Narration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System, Capitalism and Market

Rodney Peffert¹/Script, Hong Lou²/translation

(1. *Philosoph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Neo liberalism provides the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view about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capitalism. The author criticizes it from five aspects: the assertion that capitalism has defeated socialism and can not be replaced is extremely hasty;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is no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apitalists are not indispensable to the efficient functioning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modern economic system should guarantee sufficient investment income to attract capital, and in order to avoid recession and depression, private capital should be drawn to the “economical” part of economy entity, which are not true; Neo liberalism is not the best arrange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capitalism; socialism; capital markets; neo liberalism

【责任编辑 张慧英】